

减少中美误判: 一种机制建设的尝试

刘卫东

[内容提要] 当前,互信不足已经成为国内政界和学界论及中美关系时必谈的一个话题。缺乏互信本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其后果并不致命。相对而言,误判带来的风险要严重得多。对中美两国来说,致力于减少误判比增进互信更为迫切也更为可行。加强沟通交流是中美减少误判的必要途径,但如果缺乏一套明确公认的互动标准,则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无法为减少误判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在当前现实下,稳定中美关系的一种可行举措就是立即着手制定一套两国承诺共同遵守且具可操作性的互动行为规范。即使互信一时难以建立,此举也有助于降低两国关系因为误判而失控的几率。

[关键词] 中美关系 信任建设 战略误判 制度建设

[作者介绍] 刘卫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历来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也是美国最为关注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风险,并非价值分歧、经贸争端、军事冲突这些看似无解的传统难题,因为双方在处理此类争端时存在大量经验可供借鉴,且在互动中已建立起一定程度的默契,只要保持理性,两国政府都不会允许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更严峻的问题是,一些敏感的突发事件,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渲染、军工复合体的推动、利益集团的绑架、内部派系斗争外化的激发下,迅速演化成涉及到意识形态、国家尊严、政党命运、民族生存等核心利益的对抗和较量,使骑虎难下的中美决策层无力作出理性应对,导致事态迅速升级失控,出现双方都不愿看到却又无法避免的严重后果。在这一过程中,互信不足并非促使中美出现非理性对抗的充分条件,从中美交往的历史来看,在关键议题上的误读误判才是导致错误决策并给中美关系带来巨大冲击的根本原因。稳定中美关系,必须首先致力于减少误判。

一、增进互信与减少误判

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增进互信与减少误判显然都很

重要。“缺乏互信是中美关系中核心问题”的观念流传甚广,导致两国决策层和战略界对两者的关注度形成明显反差,这已对两国的互动造成了影响。为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有必要首先厘清两者的逻辑关系。

第一,增进互信在理论上存在根本性制约。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意味着基于对对方行为意图的积极期望而愿意接受由此带来的风险。^①互信则是彼此的相互信任。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的首要追求是确保自身能安全地生存,而与他国建立互信则要承担相当的风险。在多数情况下,拒绝互信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尤其在面对不太熟悉的对象时,“健康剂量”的信任和怀疑并存,即信任存在“建设性紧张状态”的社会结构最稳定,^②因此保持一定的怀疑确有其存在价值和需求。对博弈论的研究表明,从短期来看,持续的背叛会让人得到最大的回报,尽管诚信可以使人的长期利益最大

① Rousseau, D.M., Burt, R.S., Sitkin, S.B., and Camerer, “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 A cross-discipline view of tr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 393-404. 转引自姚琦,马华维《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当代心理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 年 第 6 页。

② Roy J. Lewicki, Daniel J. McAllister, Robert J. Bies, “Trust and Distrust: New Relationships and Realit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3, No.3, 1998, p.450.

化,但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做长期打算,所以背叛看似每个当下的最好选择。^①相互保持怀疑和警惕自然也就成为这一背景下的正常反应。美国学者弥尔顿·罗森伯格(Milton J. Rosenberg)在谈及美苏互疑时曾谈到“增加美苏关系可靠性的最佳途径,就是停止撒谎、伪造和摆样子。”^②但现实则正如詹姆斯·伊尔斯(James Eayrs)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外交行为中失误不断,政府并非不乐意对此加以利用,在面对外国政府和外国民众时,他们的行为是恶劣的、欺骗性的、奸诈的、残酷的。”^③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均对互信的问题开展过研究,但其最终结论均不乐观。^④正是因为建立互信的过程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它往往只是作为一种长远目标而非现实追求而存在。

总的来说,怀疑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益计算后的需要,即怀疑对方比相信对方的结果更为稳妥可靠;二是印象和感觉的需求,即因价值、目标或者感情不同因而不能相信对方。以此来看,中美当前互信不足是难以避免的。一方面,中美相互正处于力量此消彼长剧烈变化的特殊阶段,霸权国家和崛起国家之间相互猜忌是自然反应,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走势既增大了美国的危机意识,也激发起中国的复兴雄心,导致两国在互动中都倾向于在认识上强化对方的攻击性和自身的脆弱性,而原本常见的国家间分歧也在这种敏感的语境下被放大,使两国均在潜意识中追求利用质疑对方意图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安全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中美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截然不同,导致双方的共同语言先天不足,甚至关注问题的习惯视角也有明显差异,相互理解的难度较大,在对方眼里都容易被视为异类,尤其是随着社会的演进和两国联系的增多,中美国内的价值和利益的集团化色彩愈发明显,一批对对方强烈不满的群体积极争取参政议政,他们或出于部门及个人私利,或被意识形态主导,均倾向于认定或宣扬对方对自己不怀好意,并极力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这些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注定了互疑将会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主旋律而长期存在。一直关注中美互信问题的王缉思教授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不互信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恐怕永远也

不会达到一个真正的互信。^⑤两位美国学者也在2015年一份反思中美关系的报告中宣称“美国和中国之间实现根本的信任……没有真正的可能。”^⑥

第二,在实践中改善互信的努力收效不大。虽然存在上述难以克服的障碍,但由于中美两国政府均意识到互信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价值,所以还是为改善互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主要的举措就是增进交流对话,其级别之高和范围之广往往都超出了各自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水平。但客观来说,在很多官方场合中热烈友好的交流气氛并不能掩盖双方长期会上各说各话、会后各行其是的现实,交流的增多未能有效帮助改善互信。其原因在于:其一,两国安于各说各话。在中美关系中我们常常不自觉地采用类似于“一中各表”的表述方式,它始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原本只是为取得更重要的战略共识而在分支问题上暂时搁置分歧的一种妥协技巧,但随后逐步成为双方乐于采用的日常惯例,相对于在分歧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各说各话显然更有助于维持一种大体稳定的表面关系和融洽气氛,但长期的“面和心不合”也会导致双方逐步丧失对达成共识的信心和需求,转而习惯于对对方的真实意图始终保持敏感和警惕,以免落入想象中的对方圈套。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上中美始终存在的“不合拍”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由于中美未能成功调和在对其内涵理解上的分歧,这一不断出现在双边会晤场合的积极倡议始终难以在现实中发挥期待的作用。如果求同存异从手段变成为目标,即使互信不足也可以通过简便易行的“存异”来维持表面关系的稳定,那么在现实问题的压力下各方冒险追求互

① [美]大卫·德斯迪诺著,赵晓瑞译《信任的假象:隐藏在人性中的背叛真相》,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② Milton J. Rosenberg, "Attitude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Era", in James N. Rosenau,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135.

③ James Eayrs, "Right and Wrong in Foreign Polic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6, p.32.

④ 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⑤ 王缉思“中美或永远达不到真正的互信”,<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exclusive/2013-11/2046992.html>。(上网时间:2015年9月24日)

⑥ Robert D. Blackwill,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http://www.cfr.org/china/revising-us-grand-strategy-toward-china/p36371>。(上网时间:2015年9月24日)

信的意愿就会大打折扣。

其二,两国没有共同的行为标准。目前中美在大量具体议题上互不理解、相互指责,除了深层原因外,还缘于两国缺乏一个公认的评判标准,一方总是惯于拿自己的原则去评判另一方的言行,自然常会感到不满和受挫。比如,美国总是喜欢用自己的人权标准来套用中国,而中国也常常基于自己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厌恶美国的指手画脚。由于中美是两个自豪自信的大国,谁都不愿在涉及到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问题上公开向对方妥协,而设身处地进行换位思考的内部建议也常常受阻于各自官僚机构的情性、相互的“敌人意向”、风险意识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干扰,因而不管双方如何积极接触,只要看待问题的标准不一,期待相互理解就很困难,更奢谈建立互信了。

其三,两国的行动严重滞后于表态。目前为止,中美都倾向于不断重复宣示自己对于某些问题的“客观”认识和对方观念的明显谬误,不厌其烦地敦促对方尽快作出“正确选择”,长期坚持“我说你做”的模式,在有分歧问题上争取达成共识的意识和努力明显不足。缺乏互信带来的挑战毕竟是抽象的、事关长远的、容易预期的,为改善互信而首先主动作出妥协所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却是明确的、迫切的、结果是难以预测的,双方均不愿为建立互信而付出过高代价,导致两国改善关系的努力很多是流于形式。

其四,两国在建立互信程序认识上的不同步也妨碍了相关努力。中国认为建立互信是讨论具体问题的前提,没有互信就无法开展工作;而美国则倾向于首先通过合作解决具体问题,相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能逐步积累互信。^①这颇像中医和西医在行医原则方面的差异,中医强调整体施治,西医强调着眼具体。因为事关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期待两国为达成某个具体目标而改变行事原则并不现实。

第三,危机的减少得益于误判的减少而非互信的改善。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在增进交流与增进互信、减少误判、减少危机的因果关系中,存在一条复杂甚至有些出人意料的链条,那就是加强交流未必能增进互信,却可以通过减少误判而减少危机的发生。在当前的现实中,中美为改善互信而开

展的增进交流的努力成效有限,近年来随着双边对话机制从 60 扩展到 100 多个,两国的互信甚至还在下降,集中表现于相互在对方政策圈、智库和舆论中的印象变差,以及双方民意之间的信任度和好感度不断下降,^②较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美国推出再平衡战略和中国建立亚投行的问题,一方的解释越多,另一方的怀疑就越大。与此同时,随着交流的深化,中美之间互动时的具体误判却在明显减少,近年来虽然中美原有的矛盾和分歧依旧,甚至还不断冒出像网络安全、空间安全和南海问题之类的新冲突点,但在处理“无暇号”事件、“小鹰号”事件、中国发射反卫星导弹、王立军事件、“考彭斯号”事件、中美军机近距离接触等等新的突发事件时,两国官方的相互判断和对事件性质的认知较之于以往都更为理性客观,避免冲突升级的意图也很明显,在中国国内没有出现台海危机和炸馆事件后关于美国是否准备挑起对华战争之类的争论,美国国内也没有再现像撞机事件以后媒体集中妖魔化中国的现象,不仅类似于老布什时期的“八九”政治风波,克林顿时期的李登辉访美、台海危机、炸馆事件,以及小布什初期的撞机事件那样的严重危机,都没有在小布什后期和奥巴马的任内重演,而且中美在美国对台售武、美国总统会见达赖、经贸和人权争端等存在传统分歧议题上的互动也更有分寸也更为协调。由于沟通交流的增多,^③两国对对方的意图和决策模式都更为熟悉,有越来越多的先例可循,虽然并未因此而更为相信对方,但实际互动中出现误判的几率却大幅降低,这对于减少冲突意义重大。

第四,减少误判与增进互信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减少误判与建立互信的关系来看,其一,建立互信属于相对抽象的范畴而减少误判则更为实际。互信来自于对对方言行的熟悉、理解与认

① 徐辉“中美军事互信为何难以建立”,《外交评论》2010 年第 2 期,第 25~26 页。

② “美国民调显示中美对对方国家好感度均下降”,<http://www.jinrong.com/news/6/16833.html>。(上网时间:2015 年 9 月 24 日)

③ 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最近撰文指出,2014 年两国间航空旅客达 430 万人次,接近于每周 8 万人次,预计今后将保持每年 15% 的增长速度。“傅莹: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理解与误解”,http://www.guancha.cn/fuying/2015_09_12_333935.shtml。(上网时间:2015 年 9 月 24 日)

同,具有完全的主观属性,即使一方认为已经提供了足以令对方信任自己的客观证据,对方也不一定持有同感,互信的程度很难用具体尺度来界定,也无法用自认为适当的具体言行去确立和保持。而误判的起因则相对比较具体明确,一是缺乏足够的有价值的信息,二是各种因素干扰了对所获信息的科学研判。如果能够尽量获取足量的有效信息,并在主观上注重尽可能减少各种可以预知的干扰因素,那么减少误判就比增进互信更具可操作空间。

其二,增进互信短期基本无望实现而减少误判的相关举措可迅速实施并很快显效。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没有证据显示社会交往与增进信任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①而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并没有使信任变得容易,^②这就意味着诸如加强交流的主动行为和依赖加深的客观环境对改善互信均无明确的作用。如果原本就缺乏互信,双方都会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有意无意阻碍对方更多了解自己,那么为了改善互信所进行的交流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将是受限的;如果缺乏基本的认同,还可能出现交流越多越不信任的局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互动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增进互信需要持续的积极互动来帮助塑造对方的正面形象,但这在现实中时常会受挫于国家关系常态化的反复和波动,所以改善互信往往会以进退交替的面目出现,很难线性发展。而从减少误判的角度看,在加强交流沟通——加深相互了解——熟悉行为模式——减少错误判断之间存在一个合乎逻辑的明确递进关系。只要能提高有效信息的获取量和优化信息分析处理的框架及程序,减少误判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期的,而误判的减少能够帮助提高各自处理双边关系时的信心,提升双方互动结果的确定性,从而促进相互关系的稳定。

其三,缺乏互信的危害比较潜隐而出现误判的负面后果会迅速显现。缺乏互信属于国际关系中的常态,本身并不致命,只是一种影响决策的“背景噪音”。其最主要的潜在危害,就是加剧主观因素对决策的干扰并可能导致误判,从而将认识领域的风险转变为政策领域的危机,但缺乏互信自身并不直接伤害双边关系,甚至可以长期伴行于两国的和平相处;而一旦出现误判,轻则在观念言辞上造成两国

的敌视对抗,重则在行动上对双边关系的安定甚至整个地区的格局造成冲击。这意味着从减少误判着手是比增进互信更为可行也更迫切的稳定中美关系之道。布鲁津斯学会的学者李成对此也深有体会,他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表示“不误判比互信更重要”。^③

二、减少误判的制度性规范

误判的产生有多种原因,而认知因素在其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在不同的决策主体之间存在不可回避的认知差异,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主观因素对信息处理的干扰,再明智的决策者都难以彻底消除这些认知差异所导致的错误知觉,因此误判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能力减少误判的发生几率。既然个性化的认知差异是导致误判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够采用相对标准化的信息获取和处理机制来降低个体因素在其中的影响,那么从理论上说通过减少双方认知的差异来降低误判发生的几率是可以实现的。

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多种制度、机制和规范,但其覆盖面往往偏重于战略层面、注重原则而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强调协商对话而实际约束力不足,甚至有些因仅作为表达合作意愿的载体而事实上已经失效,因而对两国日常接触交往所能提供的指导有限。在当前局势和需求下,两国与其总在口号和形式上下功夫,倒不如立即着手制定一套共同承诺遵守且具可操作性的互动行为规范,用可以预期的标准互动程序来弥补难以预期的对政策内涵的解读,就可以尽量降低价值和心理因素对决策的干扰,提高各自对方政策的认知水平,减少主观臆断的成分,增强对对方行为的判断和预测能力,为科学决策提供必要的条件。尽管这不能保证避免冲突的发生,但至少可以有效减少由于误判而带来的冲突,意义依然重大。

① 参见[美]埃里克·尤斯拉纳著,张敦敏译《信任的道德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55~159页。

② 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7页。

③ 王衍“中美关系:不误判比信任更重要”,<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622>。(上网时间:2015年9月24日)

中美相关努力的政策选项包括多个方面。首先,提升相互间的认知水平。从理论上说,相互了解的程度决定了准确认识的程度,了解的越多则出现误判的机会越少,所以增进相互了解、提高认知的水平就成为减少误判的重要途径。但现实中人们对于主动了解自己对手的意愿和耐心常常不足,往往倾向或习惯于想当然,因此引入制度性因素来帮助甚至迫使双方提升相互认知的能力和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预联预知制度方面,在处理敏感的双边问题时,一方应基于历史经验将可能存在分歧甚至引发争端的重大问题尽早、主动向对方作出全面客观、有建设性的通报、解释和说明;在处理涉及到两国利益的多边问题时,两国需提前沟通以保证事先了解各自基本立场,避免突然公开作出单方宣示;在面对涉及单方的多边问题时,无关方也有义务应对方的要求而将自身的公开姿态提前告知相关方。

在明确信号制度方面,对于出现争端的问题,双方要直接进行正面交涉,并在第一时间向对方发出明确、连贯和无歧义的信号,这一信号应由权威部门通过适当的公开渠道发出,确保外界可以无障碍地获知,其他政府机构需积极配合以维护这一部门和渠道的权威性。在发出信号前两国高层有义务协调好各自不同部门之间的诉求和立场,避免政出多门、前后不一,人为增加对方误判的几率。

在常态交流制度方面,双方要始终保持信息交流渠道的通畅,不将关闭主要的官方交流渠道视为一种报复手段,做到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各方总有途径将自己希望表达的信息迅速准确传递到对方最高层;同时要完善二轨交流渠道的效能,放开并促进半官方、非官方机构对两国间敏感议题的跟踪研讨,提高官员与智库学界互动的级别和频度,使二轨交流切实能够成为对官方交流渠道的补充和极端情况下的替代。

其次,加强对“背叛”及报复行为的管理。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中美制定的一些政策很可能与对方利益相悖,出现冲突在所难免,这种“背叛”以及双方随后的报复性互动都是一种正常现象,本身不足为奇。但由此而产生的相互敌意往往会导致对另

一方的“共情”(即设身处地看问题的意识)减少,从而趋于针锋相对的对抗。因此对背叛和报复行为进行有效管理就成为减少误判的重要环节。

在自审制度方面,当一个国家制定涉及到对方的政策时,应同时考虑对方的反应,包括其究竟担心自己什么,对方可能如何评估己方的战略动机,己方的言行是否可能导致对方的误解,何种举措会迫使对方采取行动,并可能使危机上升到自己不希望达到的强度,自身决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否浓厚,等等,争取在出台的政策中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照顾到对方的心理感受,降低其被挑战感,避免对抗升级。

在预示制度方面,双方在日常交往中,应将各自认为至关重要的利益关切提前通报给对方,明示什么是自身的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与重要利益,在所涉具体议题上明确自身的官方立场,明示自己的底线,对方的何种行为将迫使自己做出报复,报复手段将会涵盖多大范围,相信何种选项对双方均是可取的,期待以何种方式与对方开展合作,等等,以帮助对方提前了解己方的真实关切和可能反应,为可能的妥协做好规划。

在报复制度方面,在出现冲突后,中美的相互报复不仅是一种合理反应,也是完成互动完整程序的必要一环,适当的报复可以帮助对方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帮助自己建立信用,不妨坦然面对。但报复要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明确的针对性和阶段性,目的在于展示立场、警告而不是羞辱甚至伤害对方,程序上要有内部提前通报,手段上要就事论事、适可而止,防止将报复举措扩散到不相干的领域,始终保持沟通渠道的顺畅,同时对于对方的政策调整应迅速做出可感知的回应。

再次,提高应对分歧的水平。中美存在分歧在所难免,但在如何应对分歧的问题上两国还缺乏足够的默契,并曾因此而导致冲突的升级。中美可尝试为此设定规则,以便将分歧对双边关系的冲击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相应举措可以包括:

在分歧会商制度方面,中美应对分歧的举措基本取决于其对分歧的认知,如能清楚了解甚至理解各自对于分歧的看法(而非分歧本身),就可以有效

减小对分歧的误判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两国为此应建立应对分歧的常态化机制,定期对现存和可能出现的分歧进行提取、汇总和辨析工作,并组建由两国官员和学者参加的联合工作组,对分歧进行不设限的共同研讨,如无法对分歧的成因和应对举措达成共识,至少也要确保能分享各自对分歧的真实认识,以减少决策中的错误判断。

在分歧管理制度方面,大国在出现分歧后相互示强的现象并不少见,中美国内试图影响决策的各种声音不断增多也是大势所趋。虽然这都难以避免。但在分歧公开后至少各自官方表态要做到前后协调一致、官方媒体应避免使用过激言辞,减少官员尤其是现役军人的非授权公开表态,官方不应参与可能激化矛盾的民间行为并在有条件时进行适当管控,各方应尽可能杜绝单边行动,尤其要慎用高压手段和最后通牒。在出现分歧时如能保持相互尊重、谨慎行事,就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非理性因素对决策的干扰。

三、稳定中美关系的有效途径

为达上述目的,中美需要尽快从规程、机制、组织和人事四个方面开始相关建设。

就规程而言,除将上述制度成文以外,要迅速落实制定出一套双方都认可的释疑规程和实施细则,说明什么范围内的哪些议题应相互公开,公开的内容中必须包含何种关键信息,双方内部提前沟通的正常程序,回复对方疑问的时限以及出面官员的级别,就仍存分歧和疑点保持沟通的具体安排,等等。其目的在于通过清楚界定公共认知的空间来迫使双方达成同等程度的相互公开,防止信息不足和不对称导致的草率行事,并帮助双方维持继续合作的动机。

在机制方面,相对而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过于宏观、时间短促且多专注于挖潜合作,促进沟通和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不足;而现有的 100 多个中美双边对话机制则过于微观分散,有些应景之作已名存实亡。为此,中美应建立季度或月度常态化沟通机制,由中国外交部司长级官员和美国国务院对等官员负责统筹,根据需要邀请各自军方、商界、媒体、

学界及其他相关人员加入,及时就热点、分歧、疑虑进行沟通,目的在于展现和了解双方真实立场,而非一定要达成共识,同时将各类热线机制尽快落到实处并充分利用起来。

在组织方面,为便于履行上述职能,中美应分别建立一个常设互动机构,由包括外交、商务、国防、司法、文化等部门的官员组成,并始终保持两国此机构或对口部门之间的密切沟通,如固定的日度或周度电话、邮件或视频交流。在建立上述各项机制和规程之前,这一机构负责就相关安排进行前期准备;在各项机制完备后则在其指导下负责日常即时交流的具体操作,其职能包括内外两方面,一是负责收集汇总己方各部门的关切并经最高层审核形成统一意见,二是将此意见传递给对方对口部门并将其回应报送本国最高层。

就人事而言,中美应分别设置一个主席和总统特使,在美国可以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的一个高级职位,在中国则可以是负责外事的国务委员,或者外事领导小组、国安委、中央政研室内的高级官员,其职能主要是在需要时撇开各自国内利益集团的干扰和行政机构繁文缛节的约束,相互直接交流并向各自决策者汇报来自于对方高层的关切和信息,他们还要负责为首脑协调各部门职能和要求提供咨询建议。这一官员对外的公开身份可以并不局限于专事中美关系,但其主要职责应集中于应对中美关系。^①

上述努力是基于如下现实。从战略上说,中美双方都很清楚维护双边关系稳定的意义;可一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分歧,这种共识就难以有效制约双方冲突的升级,这意味着两国战略意图与战术操作的脱节。因此,中美亟待设立一套连接战略层面和日常战术层面的战役性规程,即明确统一的互动制度,对双方的认知框架、信息处理、沟程序序和互动模式作出相对标准化的规范,理论上这将能够

^① 美方对此亦有同感,如基辛格也建议中美双方领导人通过建立专人或专门小组联系的方式进一步保持密切沟通。参见“基辛格谈习近平访美:中美 50 年临界点说法出现好多次”,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5_09_13_334059.shtml。(上网时间:2015 年 9 月 24 日)

大幅降低主观因素对决策的干扰,将战略需求客观、正向地传递、投射到战术操作领域,帮助双方认清各自的意图和行为方式,相对准确地预判互动的各种可能前景,为大幅降低误判的空间创造条件。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剩下的问题则主要是根据自身利益需求来选择应对策略,而此举将在对对方基本不再存疑的背景下来完成。放在双边关系的框架下,这种努力是以同时、同等降低双方行为的灵活性为代价来换取对双方行为可预测性的提升,以双边互动的确定性的增强来帮助减少误判,并促成双边关系的相对稳定。达成这一安排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其一,中美双方必须具有稳定双边关系的共同需求,而并不试图利用人为激化矛盾来获取单边收益,这一点看来可以满足。其二,中美必须愿意接受同等的约束。表面看来,作为强者的美国对维持关系稳定需求的迫切性不如中国,但强者对关系不稳所带来的不安全的耐受性也同样低于弱者;中国虽然似乎一直对接受与美国同等标准的选择比较排斥,但稳定中美关系具有战略意义,这一同等标准只是程序性规范,对中国整体的外交战略没有影响,代价有限而收益明显,同时接受同等标准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因此接受这一预防性举措能够给中美带来双赢。其三,相关机制的作用范围要局限于程序性安排而不涉及双方具体的外交规划。只有限定于程序性安排而非更敏感的价值观念与利益判断,实施起来才容易为双方共同接受;只有限定于程序性安排,灵活性的丧失才是有限的、可控的,不会因为接受这一制度就完全被束缚住手脚;只有限定于程序性安排,进行这种尝试才不需要决策者承担过大的心理压力和国内反弹。

四、结 语

中美之间唯一的正面冲突发生在朝鲜战场上,学术界有很多观点认为中美当时对对方的战略意图及战术层面上的决策都存在误判。^①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国家统一、中美关系的演变乃至世界格局都造成了重大影响,东亚格局至今还残留着朝鲜战争的明显印记,足见误判危害之大。随着近来中美冲突的加剧,当前两国国内的阴谋论都大行其道,对政

府决策和社会舆论形成强大压力,导致对通过减少误判来维持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显而易见,单靠顶层设计无法达成减少误判的目标,只有借助于在两国官方事务层面和社会领域持续不断的积极努力,才有可能将减少误判的具体举措落到实处。中美两国政府已开始就此进行了具体尝试。2014 年 4 月 22 日,在包括中美在内的 21 国参加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这一旨在缓解海上紧张局势的规则对海军舰船和飞机意外相遇时的机动规范及通信程序等内容做了规定,中美在亚丁湾的护航舰队首次为此进行了演练。2015 年 5 月,美国“沃斯堡号”濒海战斗舰与中国江凯 2 级护卫舰在南海相遇时,也按照规定进行了互动,美国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米希尔·霍华德(Michelle Howard)表示,双方以专业方式处理了这次相遇。^②这一尝试证明了优化制度性安排对于减少误判的有效性,也为两国继续加强制度建设提供了借鉴。在减少误判的问题上,真正的相互了解远比相互接受、相互赞同重要得多(行为体)必须试图以别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要使别人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认识和预测,他就往往获得很大的收益。^③这也正是中美今后需要继续为之而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王文峰)

① 学术界对此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如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17~330 页;牛军《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九州出版社,2013 年,第 174~211 页。

② Wendell Minnick, "Complex US-China Relations Seen at IM-DEX", <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defense/naval/navy/2015/05/24/imdex-singapore-china-us-warship-stabilize-islands-reclamation-south-sea-east/27712207/>.(上网时间:2015 年 9 月 25 日)

③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 年,458~459 页。